

和平發展觀察

2016年第7期（总第14期）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

2016年4月18日

日对华政策两篇

张云

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国际关系学副教授

- 从安倍政府国内政治资源看中日关系.....(2)
- 日本“拉住美国”战略需求与对华“战略无视”.....(11)

从安倍政府国内政治资源看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经历了 2012 年“钓鱼岛国有化”和 2013 年安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严重冲击后跌入谷底。经过双方努力，以 2014 年 11 月和 2015 年 4 月两次习近平—安倍会谈和 2015 年 11 月李克强—安倍会谈为标志，中日关系有了一定程度的缓和。然而一方面，安倍内阁反复强调重视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近期任命外务省“中国通”横井裕担任驻华大使，旨在加强对中国的分析、理解和沟通，以期改善双边关系；另一方面日本似乎越来越朝着“处处与中国过不去”的方向发展。1 月中旬，安倍在接受《金融时报》专访时对中国在海洋问题上的作法提出尖锐批评，认为中国在海洋问题上咄咄逼人，提出国际社会要一致对挑战国际秩序的行为发出声音；去年在亚投行问题上，日本是西方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同美国一起没有加入的国家，而且表示质疑的调子比美国还要强；在印尼等国家的高速铁路等海外基础设施建设上，中日之间的竞争意味似乎超过了促进地区互联互通本身。对此，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的记者会上针对中日关系说，“日本政府和领导人一方面不断声称愿意改善日中关系，一方面又刻意到处给中国制造麻烦。这是一种典型的双面人的做法。”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安倍政府这些相互矛盾的信息？“重视中国”的信号是否都不可信？“对华强硬”的信号是否都应全信？这些认知将直接关系到对日政策

的选择，本文主要从日本国内政治角度进行分析。

一、安倍自民党独大与丰厚的可视性国内政治资源

世界上不存在纯粹意义上的国际政治，任何政治首先是国内和本地的，同样考察中日关系也不能够离开对日本国内政治生态的分析。从表面上看，安倍政府可能是近年来日本政治最为明晰的时期，2012年底再次执政的安倍内阁是继小泉纯一郎以来少有的长期执政内阁，支持率也比较稳定地保持在50%左右。同时，安倍晋三又被普遍认为是日本保守右翼政治家的代表性人物。对中国来说，安倍内阁是否会利用自民党一党独大的格局及其国内政治基础稳定的优势，在历史认识、宪法修改、安保政策上毫无顾忌地推进其保守政治日程，从而可能对中日关系造成根本性破坏的担忧始终存在。而这个担忧的实质是要回答以下问题：即安倍自民党独大现状下日本的对华政策是否还存在国内政治制约因素。笔者认为这需要从可视性和非可视性国内政治资源两个角度的框架来分析安倍政权才能够得出比较完整的图景。

从可视性政治资源（tangible political resource）角度来看，安倍政权在决策上（包括对华政策）基本上看不到太多制约因素。

从政治精英层面来看，2014年底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2015年9月，安倍晋三更是以无投票方式再次当选日本自民党总裁，同月在不少民众反对中，新安保

法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并于 2016 年 3 月付诸实施，这些都说明安倍晋三在执政党内部权力基础稳定。在国会中，自民党-公民党执政联盟目前拥有众议院 475 个议席中的 325 个，参议院 242 个议席中的 136 个，在众参两院都处于多数，这意味着不会面临国会拉决策后腿的问题。同时，在野党仍然处于分裂状态，最大的在野党民主党支持率仅为 10%，而自民党大约为 40%。民主党下野后无论在理念还是在政策上都没有提出能够同自民党竞争的有力“对案”，其他在野政党也普遍缺乏凝聚力。尽管 2016 年 3 月，民主党和维新会决定合并成立新党“民进党”，但该新党能否成为选民们可以考虑的自民党的代替选项前景并不乐观，日经新闻 3 月底的民调显示，66%的受访者表示对其没有期待，仅有 13%的受访者表示将在参议院选举中会投票给民进党。

从民意层面来看，稳定的支持率说明日本民众对于安倍的期待（expectation）没有实质性减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对“安倍经济学”可能会让日本经济走出“失去的 20 年”低增长的期待，尽管安倍执政后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争议很大，但毕竟在规模、手段和力度上远超出以往历届内阁的各种经济振兴政策的做法也给民众带来巨大的期待。2014 年底大选前，NHK 的舆论调查显示，52%的受访者对“安倍经济学”予以评价；**第二**更深层次的是日本民众对安倍的“强领导力”（strong leadership）的期待。经历了过去近十年走马灯式的首相更替，日本民众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来引领的心理可以说既真实又强烈。以安保法案修

改为例，2015年9月以解禁集体自卫权为核心内容的新安保法案在国会审议期间出现了近年来日本少有的民众反对“浪潮”，安倍内阁支持率一度受挫，但这股“反对热潮”并不持续。（《和平发展观察》第5期的拙作中曾经预测这种结果）2015年11月底《日本经济新闻》的舆论调查显示安倍内阁支持率上升8个百分点为49%，换言之，安倍的支持率仅两个月就恢复到了安保修改前的水平。2016年2月20-21日，共同社舆论调查显示，支持安保法案的达到47%，主张废止安保法案为38%，3月25-27日《日本经济新闻》与东京电视台联合民调显示，43%的受访者认为不应当废止安保法案，主张废止的为35%，这与半年前的情况正好发生了逆转，说明2015年9月的“反安保热潮”并不是真正的热潮，在希望日本在国际上发挥更大作用的期待以及希望重新定义日本国家认同的大目标上，民众与政治精英没有本质分歧，只不过在以什么方式以及以什么速度上没有形成共识。与此同时，各种民意调查显示，支持安倍内阁的原因中除了回答“没有其他可支持的政党”外，回答最多的是“安倍晋三有领导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政治基础稳定情况下能够顶住部分压力解禁集体自卫权被不少人认为是安倍有领导力的表现。

因而安倍政权的可视性政治资源可以说相当丰厚，而且安倍自民党独大的日本国内政治的基本格局很可能会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持续。

二、非可视性政治资源的薄弱性

但如果我们把视角转向非可视性政治资源 (intangible political resource), 就会发现安倍自民党独大格局并不意味着其能够随心所欲实现其保守政治日程, 安倍内阁并不能因表面上享有强大的可视性政治资源优势就可以高枕无忧。笔者认为可以从可信度 (credibility) 及名声 (reputation) 两大指标来考察安倍政权的非可视性政治资源情况。

从可信度角度来看, 稳定的支持率并不等同于民众的信任, 民众对安倍政权的期待与可信度是两回事。2014 年大选投票率仅为 52%, 创历史新低。自民党在小选举区的得票数也比 2012 年大选少了 170 万张。同时自民党虽获得了 290 个议席, 但比大选前减少了 2 个, 这说明安倍获得的是消极支持, 主要停留在选民对“安倍经济学”的期待之上, 同时低投票率也体现了选民们对于缺乏有力在野党政治选项的无奈。《日本经济新闻》在 2014 年 11 月下旬进行的民调显示, 58% 的受访者认为不应该大选, 而 85% 的受访者认为自民党获胜是因为没有对手, 因而这次大选的胜利很难说是安倍真正的胜利。安倍将 2014 年底解散众议院进行大选的理由归结为需要为其延期增加消费税的决定接受民意考验。¹2014

¹ 2012 年自民、公明和民主三党达成共识, 为了缓解由于社会保障费用的大幅攀升带来的国家财政债务危机, 日本将从 2015 年 10 月开始将消费税增加到 10%。安倍内阁在 2014 年底决定将增税延期到 2017 年 4 月, 他的理由是要在“安倍经济学”更加体现出推动经济增长效果的情况下增税以减少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

年大选后，安倍承诺只要不发生类似于 2008 年雷曼冲击那样的世界性金融危机或者 2011 年日本大地震级别自然灾害，将不会再延期增税。这意味安倍已经做出了必须在增税前让“安倍经济学”体现出明显效果来的政治承诺。然而，一年多过去后情况似乎并不理想，在 2015 年第四季度日本 GDP 出现负增长，国内消费依然低迷，股价上升的情况也不持续，近期日元汇率又在回升。另一方面，日本银行三年来持续实施的货币宽松政策远未达到央行提出的 2% 的通胀目标，1 月日本银行还前所未有地引入了负利率。从 3 月份劳资谈判的结果看汽车、电机等主要企业的工资增加乏力。安倍描绘的通过货币宽松政策刺激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提高收入水平的良性循环的美好蓝图并不顺利。反过来说三年过去了民众对于“安倍经济学”的支持仍然停留在期待上，对此安倍有可能会利用反对党弱的状况，再次使用推迟增税需要接受民意考验为由解散国会，甚至进行众参两院同日选举。这将会进一步侵蚀民众对安倍的可信度，3 月底的日经新闻民调显示表示对安倍经济学不予以评价的达到 49%。潜在的可信度的持续减少将会反映在支持率减少上，并影响选民的投票行为。在消费增税和经济增长的承诺都没有兑现的情况下，若安倍在外交上（特别是中日关系）上失分，将会引发民众的强烈不满。今年又逢多边外交繁忙年，日本将在 5 月主办 7 国集团峰会，中国将在 9 月主办 20 国峰会，之后日本还将主办中日韩峰会，中日关系剧烈动荡将会直接影响日本参与这些峰会质量，并进而影响安倍的可视性国内政治资源。

从名声角度来看，安倍作为右翼保守政治家的代表性人物的形象在日本根深蒂固，尽管日本民众对其“领导力”有期待，但对其是否会“滥用领导力”并不放心，民众担心过于强大的安倍自民党可能会将工作重心从经济转向修宪、历史认识等意识形态的问题上去。日本民众对于集体自卫权解禁和宪法修改这两个问题的性质的认识有很大不同。修宪直接涉及到日本战后国家认同大改变的核心问题，其难度将会远远超过前者。各种舆论调查显示反对修改宪法的比例都超过半数，明显高于支持的比例。这不是说日本民众完全反对修改宪法，而是他们普遍担心安倍可能会利用延迟增税时间为借口进行大选，并在获得众参两院都过 2/3 的优势后用来快速推进宪法修改，而不是其承诺的改善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安倍内阁强行推进将会导致国内政治和舆论的分裂，甚至使执政联盟内部出现严重裂痕，同时还可能会带来中日、中韩关系的剧烈变动，导致民众对政府批评的急剧增加。

2014 年大选中已经可以明显看出民众希望通过增加左翼政党的议席来稀释安倍的右倾保守倾向过度膨胀。表面上看自民党大获全胜，但同自民党议席数原地踏步相对应是公明党从 31 席增加到了 35 席，共产党从 8 席增加到了 21 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两个政党才是真正的胜利者，这反映了日本民众希望对自民党形成牵制，无论在安保还是历史问题上，这两个左倾政党会在今后的日本政局中扮演一定程度的“刹车”作用。尽管最大在野党的民主党在组织和政策上都缺少吸引力，仍在此次大选中增加了 11 个议席。更有意

思的是具有极右倾向的“下一代党”的议席从 19 降至 2，其最高顾问石原慎太郎则宣布退出政坛意味着极右势力在日本政治格局中的边缘化。日本的政治格局在选举后略微向左调，而不是更向右走，日本的政治格局也并没有比选举前更加右倾。

由于经济改善乏力，反对党弱，安倍近期似乎又在考虑利用选民不安又无奈的心理，在今年再次解散国会，进行少有的众参两院同时选举，并可能再次以延期增税或者为更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需要接受民意考验为理由。而民众认为安倍这样做不是为了经济，而是以此为借口扩大议席为修宪铺路的担心也上升，这些都是不确定因素。

三、冷静观察 适度表态 争取民众

基于上述分析，中国又当如何应对？首先，要有中日关系有可能实现稳定的信心。需要认识到右翼政治家一党独大并非国内政治上没有制约因素。尽管从理论上来说安倍首相拥有丰厚的可视性政治资源来强行推动修宪等保守政治日程，但非可视性政治资源方面并不坚实。如果安倍是一位务实的政治家，他应该会权衡利弊，这就是看不见的制约因素。2015 年底，自民党“历史问题考察委员会”决定推迟发表报告书，安倍也多次表示在修宪问题上不追求速度强调国民的共识。安倍的亲信官房副长官萩生田光一在 2015 年 10 月下旬的采访中也表示修宪并不一定要在安倍执政期间进行，如

果靖国神社参拜会影响外交暂停参拜也是可以的。这些都说明安倍对深层次的国内制约因素有顾忌，对于稳定的中日关系从国内政治上来说有内在需求。

第二，需要借力日本民众。要看到日本民众与中国对安倍晋三的认知没有本质的区别，都认为安倍是一把“双刃剑”，日本民众一方面对其领导力有期待，另一方面对其可信度和右翼形象警惕；同样中国对其在中日关系上不走极端有期待（2006年安倍执政时期提出建立中日战略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对其右翼言行又很不放心。这种对安倍认知的一致性就要求中国一方面不能对安倍政府的言行过度表态，过度表态很容易伤及民意，结果把民众推向右翼势力一边，保持适度接触维持正常关系；另一方面对于安倍政府严重涉及中国利益问题上则需要及时、明确表态，因为不表态同样容易被日本国内鹰派利用，以中国默认为理由来增强他们观点的正确性，但表态需要以说理为主切中要害，尽量减少意识形态定性和道德打压式的批判。中国需要认识到在国内政治层面上，中国尚未形成直接影响日本的能力，必须要有效和有艺术地借力日本民众间接影响日本。

日本“拉住美国”战略需求 与对华“战略无视”

从国际层面认知安倍政府的“双面人”对华外交不能够拘泥于中日关系双边框架。双边关系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国家对于另一个国家认知基础上的政策选择的结果，然而从深层次讲是建立在这个国家对于国际体系基本认知基础上的衍生，日本的对华外交也不例外。要理解日本的对华政策，首先需要理解日本是如何看待国际关系，换句话说，需要回答日本的国际秩序观是什么的问题。本文从这个角度入手分析安倍政府对美、对华外交的背后逻辑。

一、美国中心国际秩序观和战略思维的内在化

明治维新后，日本通过努力学习西方走“富国强兵”之路跻身世界强国行列。在世纪之交，当日本自认为已经可以同英法等国并肩的时候，“白人至上”的价值观及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帝国体系经济格局让日本认识到，当时的国际秩序没有包容性，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后的贸易保护主义则直接打击了日本经济并让国内的国际派失去了声音，随后军人开始走上前台，并以建立新国际秩序团结民众（德国的情况也相似）。二战中，日本提出了以建立“东亚新秩序”来

与战前的以欧洲列强为中心的旧国际秩序全面对决，当然最终以全面战败告终。

二战结束，以欧洲列强主导殖民地为基础的旧国际秩序崩溃，罗斯福总统曾经设想世界五大战胜国——美苏中英法，承担起“国际警察”的作用，建立新的国际秩序，这也是联合国安理会的雏形。但遗憾的是，这种建立在联合国基础上的大国协调的国际秩序并没有到来，美苏冷战的开始导致国际社会全面分裂。在西欧，美国通过建立北约和马歇尔计划建立了同盟集团；在亚洲，美国把战略中心从中国转移到了日本，并在日美同盟的基础上建立了“旧金山体制”。在经济上，美国帮助日本加入世界银行、IMF、关贸总协定等战后多边经济体制，并通过鼓励日本-东南亚-美国的三角经济关系（东南亚提供原料，日本生产，出口美国市场），不仅让日本迅速恢复经济，而且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以吉田茂为代表的战后日本政治精英主动融入上述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并且在此基础上重新构建了战后日本国家认同的两大支柱，即“美国的同盟”与“经济大国”。这两大国家认同的制度保证了以日美同盟为基础的政治安全。毋庸置疑，日美同盟是冷战思维的产物，但对于日本来说这个同盟与其说是一个军事保护的硬件，不如说是买个安心的心理软件。从经济角度来说，7国集团是基本制度保证。战后，虽然在美国主导下建立了不少多边国际经济机制，但长期以来在决策实践中实际上以“7国集团”（更加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以美国主导下的5国集团，美日英法德）为基础，这种状况在冷战结

東前达到了顶峰，当时 7 国的 GDP 约占世界经济比重的 7 成左右，G7 对重大问题的决定会带来全球结果。

1957 年，日本第一本《外交蓝皮书》提出了战后日本外交三原则，即“以联合国为中心”、“与美国为中心的自由世界各国协调”和“坚持作为亚洲一员的立场”。但美苏冷战对峙使得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形同虚设，从 1958 年开始，该原则就悄然从日本的《外交蓝皮书》中消失了。而亚洲外交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美外交的衍生，做好对美外交就能够最大限度维护日本国家利益的逻辑与上述国家认同建设相互交融，日本战后国际秩序观和外交都建立在高度内化的“美国中心”的战略思维框架之上。

二、美国中心战略思维的惯性与日本对美战略不安

进入新世纪后，在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型经济体崛起以及 08-09 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日本国家认同中的“经济大国”的制度保障——7 国集团的影响力下降。与此同时，中国、俄罗斯对冷战后美国继续坚持的军事同盟网络的忍耐越来越有限，地缘政治上的摩擦在过去几年明显增加。在这个大背景下，中日之间围绕着海洋权益的争端升温，而中美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又对日本国家认同中的“美国的同盟”的支柱产生了冲击。

这些冲击虽然很大，但是还没有大到足够冲击日本战后“美国中心”战略思维的核心部分，日本战略家们认为不

是美国实力的绝对衰落，而是美国领导世界的意愿相对衰落才是导致国际秩序动荡的原因。日本战略不安主要体现在其对美国主导世界事务意愿的怀疑和不确定。

首先，日本认为美国对日美同盟的外交辞令 and 实际承诺存在落差。在日本看来，奥巴马对外发出的信号常常相互矛盾，一边说美国将继续作为最强国家持续领导世界，另一边他又是第一位说美国不再做世界警察的总统，2016年初奥巴马总统的国情咨文演讲中呼吁，美国要考虑“在不做世界警察情况下如何领导世界的课题”；他一边说美国要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以强化日美同盟，但在具体行动上却被认为“没有力度”。例如，日本认为在南海问题上突出显示了美国“单独威慑”中国的意愿不足，虽然美国派遣军舰巡航中国人工岛12海里，但宣称这是无害通过；2月份同东盟国家召开首次峰会也没有能够发表强有力声明；核峰会上中美首脑会谈在南海问题上也无进展。

第二，美国大选中的涉日言论也让日本对“后奥巴马政府”感到不安。共和党总统竞选人特朗普批评日本利用日美同盟“免费搭车”获得安全保障，表示这对美国来说是不平等条约；3月29日，特朗普在共和党的集会上说，日本为了应对朝鲜的核威胁进行核武装仅仅是一个时间问题，如果日本不多承担同盟成本，美军就应该撤退。如果日本增加自我防卫，美国将会更加富裕；他认为日本和中国一样采用不公平贸易欺负美国；他还反对TPP并指责日本操控汇率。这些言论几乎都是对安倍晋三积极重视和推动的政策直接否

定，一旦变成美国的对日政策负面冲击可想而知。

三、“拉住美国”的战略需要与“日美一体化”的逻辑

“美国中心”战略思维的惯性让日本认为，减少战略不安的途径是强化过去的认同，这也是维护日本国际地位以及增加安心感的最佳选择。表面上看，日本处处与中国过不去，但深层次原因是日本对新的国际秩序不确定性的担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日本近年来越来越着力强化同盟，对强化日美欧经济协调的 G7 框架积极性甚至高于欧洲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更像一个用传统办法应对新挑战现状国家（status quo state），而不是有些专家对日本的判断——想要建立新国际秩序。因而，分析中日关系的核心可能不在于确定日本如何看中国，而在于日本如何看美国。日本认为过去的国际秩序在美国强烈的意愿和能力下得到实现和维持，现在美国的意愿相对衰落的情况下，需要日本等盟国展示意愿和能力，一方面补充美国意愿不足留下的空缺，另一方面激发美国继续领导世界的信心和动力。按照上述战略逻辑，“拉住美国”就成为日本的头等战略需要，而“日美一体化”成了实现这个需要的途径。

第一，通过强化日美同盟，以日美一体化来“拉住美国”。2015年4月，日美发表了新的防卫合作指针。同年11月初，双方同意设立日美同盟3个层次的新磋商机构，第一个级别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外务省和防卫省与美方的同盟协调小组，

这属于政策层面一体化；第二级别是自卫队统合幕僚监部同驻日美军和太平洋舰队共同运用协调所，这属于军事指挥部门一体化；第三是各个军种之间的协调所，这属于军兵种行动部门一体化。新指针还提出了建设一个“无缝隙、强有力、灵活、有效”日美同盟来增强应对从平时到危机的全天候“威慑和反应能力”。安倍政府还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为将来日美军事一体化减少法律障碍。2016年，日本防卫预算首次超过5兆日元，这是连续四年增加。这些做法都是为了“拉住美国”，确保美国的“亚太再平衡”不是短期行为，而是战略承诺。

第二，通过一定程度介入南海问题，发展同东南亚安全关系来“拉住美国”。中美在西太平洋的战略博弈已经从台湾海峡、东海转移到南海，日本认为在政治上支持美国等同于维护战后东亚地区的安全秩序，也就是维护日本国家利益。2015年11月19日，安倍晋三在马尼拉同奥巴马会谈时暗示了向南海派遣自卫队的可能性，说“将根据局势发展对日本安全的影响不断进行关注研究”。他还对美国军舰进入中国人工岛12海里以内进行“航行自由”军事行动表示明确支持。这些表态是日本国会通过新安保法案后首次做出的，显然经过精心考量。2016年4月初，海上自卫队潜艇15年来首次访问菲律宾军港苏比克湾。随后，日本两艘护卫舰访问越南金兰湾军港。3月中旬，日本自卫队还组织了对越南军队维和活动的研修指导。

第三，强化同澳大利亚的安全关系来“拉住美国”。如

果说日本是美国在东亚的双边安全架构的“北锚”的话，那么澳大利亚就是“南锚”。面对美国在国际事务上的“孤立主义”倾向，澳大利亚的战略不安同日本有相近之处，“拉住美国”同样也是澳大利亚政府战略逻辑的主要方面。2016年2月，澳大利亚政府发表的新国防白皮书中强调了本地区战略不确定性，并提出要增加防卫开支并建造12艘潜艇，而日本被认为是防卫合作的最有力的伙伴之一。日本政策研究院大学校长白石隆3月下旬在接受媒体采访中就提到亚洲安保框架的网络化方向。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2016年3月，日美澳三国还联合为越南海军举办研修会。

从经济角度来说，国际层面上安倍政府最需要的是获得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经济体对于其经济政策的支持。由于“安倍经济学”没有展现预期的效果，安倍试图通过更大规模的积极财政政策来刺激增长，2016年3月通过了高达96兆7218亿日元的有史以来最大的预算案，并宣布在2020年实现GDP达到600亿日元的野心勃勃的目标。日本GDP在2012年为475兆日元，2015年为499兆日元，这意味着今后5年要增长100兆日元。安倍执政后3年GDP增加仅为24兆日元，5年100兆日元的增长目标并非易事。安倍的经济逻辑是通过增长而不是通过再分配来实现日本财政健康化，而增长要通过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来激活投资、消费，带动收入增加实现经济良性循环。面对国内对他上述逻辑怀疑增加的情况，如何在国际上说服西方主要经济体协调一致地通过财政宽松政策刺激经济，直接关系到“安倍经济学”的国内合法

性。今年的 7 国集团峰会实际上为安倍营造了一个发达经济体团结一致通过财政刺激政策来推动增长氛围，一方面可以为其政策作国际背书，另一方面还可以展示其国际领导力。目前的情况是美国、德国和意大利对于财政宽松政策都比较谨慎，美国主要因为大选原因，德国传统如此。诺贝尔奖得主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克鲁格曼在自己的推特上透露，安倍晋三首相在 3 月 22 日与其会面时候说德国采取积极财政政策能力最大，要对德国进行说服。即使象征意义的 7 国集团支持积极财政政策对安倍来说都具有重要政治意义，而说服这些需要借助美国的力量。与此同时，TPP 是“安倍经济学”一直宣传的另一个重要增长点，美国是否能够及时批准对其执政合法性有很大关系。3 月底，华盛顿核峰会期间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上，安倍着重提醒奥巴马两点，一是在当前世界经济状况欠佳情况下，仍需要 G7 来牵引，二是期待 TPP 能够在年内获得美国国会通过。无论从安全还是经济战略来说，“拉住美国”都是关键。

四、“日美一体化”的对华影响

一是“日美一体化”后，日本介入南海问题不可能很深，政治意味大于实际安全和军事意义。

首先，美国并不欢迎日本实质性介入南海问题。南海问题与其说是一个军事问题，不如说是一个中美之间的战略问题。中美战略博弈中，美国需要日本在政治上的支持，例如

表态支持美国“航行自由行动”、国际法原则解决争端等。但是如果一旦日本系统性地从军事上介入南海，例如常规派遣自卫队与美军一起或者单独监视警戒活动，将会让中美战略博弈极端复杂化，中日之间的偶发事件会将美国卷入其中。正因为如此，2015年11月日美首脑会谈中，尽管奥巴马称赞安倍晋三的安保法制改革为“历史性伟业”，但对其派遣自卫队到南海的暗示并未表态。

第二，日本政府也没有决心将自身卷入南海问题。2015年11月底，就在安倍自卫队派遣南海表态后一周日本共同社调查显示，对此表示赞成为52.7%，反对39.9%，赞成超过了半数。然而有意思的是日本政府表态非常谨慎，官房长官表示日本目前没有在南海的监视活动，也完全没有计划派遣自卫队进行同美军那样的巡航活动。2016年2月，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哈里斯访日时候，针对新闻报道中国在西沙部署导弹，日本也只是要求美军加强监视警戒。与此同时，东盟不少国家也认为日本的深度介入将会让问题更加复杂。

第三，从日本能力上来说，巡航监视南海也不现实。据媒体报道，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舰艇规模在执行海外反海盗活动和东海的警戒任务外并没有太多余力应对南海。目前日本海上军事力量主要集中在东海，如果向南海派遣自卫队，势必造成东海巡航能力减弱，或者需要大规模进行军备建设，在目前日本财政状况下大幅度增加防卫开支不现实，也很难得到国内支持。从日本对东南亚国家军事能力建设的援助状况来看，也很难说是实质性大规模的支援。2015年11月，

日本向越南提供的是 6 艘二手舰艇，向菲律宾提供的是海上自卫队旧的 TC90 练习飞机。

二是日美关系并不会更加对等，同盟关系也不会飞跃性地深化。安倍政府对于日美一体化的基本逻辑有两个，第一是“日美关系对等论”，即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日本也可以为美国的安全提供帮助，这会消除原有的同盟不平衡性，减少美国认为日本免费搭车的不平心理，通过日美一体化还能够增强日本在同盟中的发言权；第二是“威慑力增强论”，这种逻辑的主要思路是面对一个不断强大和崛起的中国，而美国相对衰落，原来主要由美国承担的威慑角色需要由日本分担才能保持地区的力量平衡，在此基础上同中国交往才有底气和信心，因而解禁集体自卫权和强化同盟可以更加有效地同中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

日美一体化说易行难，处理不当将会让日美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决策一体化意味着同盟中的强势一方——美国在影响日本决策上作用增加，日本在决策中的自由度减少。即使日美一体化进一步加强，也仍然改变不了美国主导的大结构，日本最终会领悟到想要的对等关系并未实现。日美一体化从美国角度来说符合其国家利益，可以此进一步拉住日本维持在全球与地区的战略优势，但美国的战略利益同日本在很多地方不一致。例如对俄外交，日本关心北方四岛和《日俄和平条约》缔结，而美国需要盟国步调一致制裁俄罗斯，日美一体化可能会让日本外交自由度进一步减少。军事行动一体化则会让双方都感到被卷入的危险增加。例如日本如果

要求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共同设计作战计划，美国将很难处理；相反如果美国希望日本扮演全球规模的军事盟友，而日本则并没有这个心理准备，这些相互测试会让同盟关系受损。

五、日本对华“战略无视”与中国的选择

无论从政治安全上，还是经济上，日本的“双面人”对华外交自然引发中国的反对和质疑，安倍也不可能没有预料到中国的反应。然而，由于安倍主要战略需要是“拉住美国”，中国因素基本上被无视。尽管日本的对华强硬信号不可全信，但这显示安倍政府尚未从战略层面考量对华外交，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华“战略无视”（strategic ignorance）。如何“拉住美国”继续原有的国际秩序观，从而维护日本利益的逻辑几乎垄断了日本战略思维，结果造成了日本对华战略思维处于停止状态。

第一，面对日本对华“战略无视”，中国单方面的战略对待中日关系以及进行深层次的战略对话意义将会很有限。国务委员杨洁篪和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之间建立的中日高级政治对话机制已经进行了两次，为双方首脑会谈准备和高级事务沟通提供了重要平台，需要坚持下去但不可以期待过高。中方将这个机制定位为高级政治对话，日本方面官方报道中并没有出现这样的定位，这说明日本在战略上还没有准备好。今年日本主办7国集团峰会，中国举办20国集团峰会，按理讲是双方共同讨论如何将这样两个峰会

变成讨论国际秩序重建的论坛，但日本对中国的需求尚处于功能性的层面，而非战略性，因而高层级的战略合作可能性很有限。正因为真正的战略沟通还难以进行，防卫方面的合作就不可能走得太远。例如海空联络机制具体运用的磋商，东海油气田共同开发磋商，这些具体合作都需要政治战略沟通作后盾。没有高层级的战略政治互动，即使磋商开始或者达成一时的具体共识，在政治事件冲击面前同样很脆弱，那时候对互信打击更大。

第二，真正的战略沟通难以实现并不等于维持正常国家关系的交往也要限制。从短期来看，安倍政府对于一个稳定的中日关系还是有一定现实需要的。尽管中国经济由于减速，“安倍经济学”对于中国的期待减少。但是，中国在 20 国峰会上对于安倍晋三的经济政策就算不支持至少不唱反调也很关键。

第三，面对日美同盟向着一体化方向演进，中国既要重视，也需要冷静观察不过度反应。鉴于上述分析的日美一体化的实现需要双方牺牲决策和行动自由度才能实现，而美国不大可能这样做，那剩下就是日本牺牲自由度。日本最终将会面临另一个抉择，究竟是选择成为美国的第 51 个州还是战略独立。中国要看清日美一体化主要是一个日美游戏，最终需要日本的自我醒悟，而那种积极离间日美的想法不仅误导，而且会起反作用。

第四，中国需要从侧面让日本领悟两个道理，一是日美一体化不会提升其对华战略地位，二是日美一体化也增强不

了对华威慑力。从中国来说，日本选择日美一体化就意味其战略自主空间进一步受到限制，而军事一体化则会让日本在军力发展、部署、行动上进一步受到美国控制，这样一来中国与日本进行直接战略安全沟通的意愿自然受损，因为从战略上来讲中美的有效沟通就可以管好日本的不确定性。中美战略沟通紧密化以及中国与东南亚战略关系强化，将会对日本重新思考战略逻辑起到间接作用。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保持中美关系在换届期间的平稳过渡非常重要，同时菲律宾今年也逢总统选举，如何同下一届新政府建立较好的工作关系也是需要认真考量的事情。

（责任编辑：刘昆仑）

稿 约

《和平发展观察》是展示和平发展研究所动态的窗口，也是业界同仁交流思想和研究成果的平台。欢迎各位同仁围绕影响当代和平发展的国际国内重大问题，自选题目，惠赐佳作。希望来稿以学理为基，以形势、政策研究为干，立足解决当前现实问题。观点鲜明、立论有据、逻辑清晰、简明晓畅、直奔主题，字数以 5000 字为宜。来稿一经采用，稿酬从优。

来稿请邮：hpfzs@cass.org.cn

请勿一稿多投，两周内未收到回信可自行处理。

和平發展觀察

执行主编：廖峥嵘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洼西里颐安嘉园 11 号楼

邮编：100089 传真：010-88515507

电话：010-88515505

邮箱：hpfzs@cass.org.cn



发刊日期：2016.4.18